

毛泽东抗日持久战思想解读

朱 晶

(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

〔摘 要〕 毛泽东的抗日持久战思想从中日双方综合国力对比的角度,将民族动员与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融为一体,并在揭示持久战应对策略的过程中强化了民族动员,从而对激发民族热情,赢得战争胜利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关键词〕 持久战; 抗战; 综合国力; 民族动员

〔中图分类号〕 K264;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5)05-0027-06

19世纪中期,中日两国在西方的军事经济压力下,不约而同走上了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道路。古老中国的现代化自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进而深入观念层面,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迂回曲折地向前推进,现代化进程一波三折。大异其趣的是,东邻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全方位改革,在政治上王政复古、废藩置县,经济上殖产兴业,文化上文明开化,军事上富国强兵,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并跻身东亚唯一的帝国主义强国。国富兵强的日本为仿效西方成为地区乃至世界霸权国家,自明治时代便走上了向外扩张的道路。在谋求东亚霸权的过程中,中国成为其最大的障碍。因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征服中国上升为日本的国家战略。

甲午战争中,天朝古国败于蕞尔小邦日本,朝野震惊。战败的刺激和列强的宰割,使中国的民族主义从一种单纯的“精神状态”发展为一种“思想运动”和“广泛的意识”^[1]。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由“天下”向“国家”转型过程中凝聚新的政治认同最为重要的一股意识形态。由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政治社会转型处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全球扩张的国际环境下,国家屡屡遭遇侵略战争的危机,直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国家命运危在旦夕。国民党内出现“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倾向。前者认为中国在日本的侵略下将走向灭亡,后者相信中国可以很快取得战争的胜利。

霍布斯鲍姆在其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中认为,“再没有比共同抵御外侮,更能使焦虑不安状态下的人群团结起来。再没有比国际冲突更能激起双方的民族主义。”^[2]在生死攸关之际,毛泽东的抗日持久战思想成为鼓舞全党全民族的士气,动员全国军民各尽所能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战的思想基础。尽管过去学界对这一思想的研究汗牛充栋,但多是介绍《论持久战》的完成过程、主要内容、揭示其中的辩证思维、战争规律或战略战术,而少有从民族动员的角度予以探讨。笔者以为,毛泽东的抗日持久战思想从中日双方综合国力对比的角度,将民族动员与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融为一体,并在揭示持久战应对策略的过程中强化民族动员,从而对激发民族热情,赢得战争胜利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一 综合国力对比与民族动员

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就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提出了持久抗战思想。他在该文中一针见血地道出日本要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的意图,并在分析国内革命和反革命两方面的形势后明确表示:“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3]在1938年的《论持久战》中,他又从综合国力对比的角度分析了中日两国在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大阶段的优势与劣势,并在此基础上动员全国军民树立抗战胜利的信心,并为争取战争的胜利而努力奋斗。

两国交兵,综合国力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综合国力的强弱又与一国所掌握的资源密不

可分。国际关系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家汉斯·摩根索从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事力量、人口、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质量、政府质量等要素出发,评估一国实力的强弱。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也从这些要素出发,对中日两国综合国力进行了对比分析,并以此为依据判断战争的走向。

地理作为“一国权力所依赖的最稳定的因素”^{[4]152},是综合国力构成的一个基本要素。中国广袤的国土被视为国家力量的永久源泉,是挫败日本军事征服的一个重要砝码。辽阔的地域使日本侵占的领土与其未侵占的领土比起来微不足道,中国仍可在未被侵占的广大后方积聚力量,与敌再战。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5]444}与此同时,庞大的国土造成广阔的战场,也为中国军队采取运动战的战略方针,通过迅速前进和迅速后退,以及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尽管中日两国地理接近,加剧了中国抗战的困难,但中苏的地理接近,却成为中国争取苏联支援进行抗战的有利条件^{[5]456}。

自然资源是“一国相对于他国的权力具有重要影响的相对稳定的因素。”^{[4]155}中国地大物博,辽阔的后方能够为持续性的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粮食和装备。相较之下,日本不但是小国,而且地小物少,资源有限。在毛泽东看来,尽管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日本通过占领中国领土,扩大了自然资源的占有量,但这种资源优势只是暂时性和局部性的。他指出,一方面,中国的游击战争将把日本的占领区“实际上限制在狭小的地带”,另一方面,日本对中国土地的占领又“产生了和加深了日本同外国的矛盾”。再则,从东北沦陷后的情形看,“日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般地只能是支出资本时期,不能是收获时期”^{[5]467}。这些自然资源要素成为驳斥“亡国论”而使民众相信持久论和最后胜利论的根据。

工业能力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现代机械、交通工具、兵器等制造能力及能力的大小。人类在17世纪进入工业革命后的三百多年来,工业能力取代农业和商业,成为决定现代国家力量大小、强弱的基本因素。尽管中国在工业能力上远远不敌日本,但中国工业水平的低下和工业结构的不平衡恰好成为中日战争中的一大优势。毛泽东认为:“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为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

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5]444}而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其工业能力和经济却“行将崩溃”^{[5]514}。

一国军队的备战程度、军事技术、武装力量的装备质量等因素,是决定战争胜负甚为重要的因素。亡国论者认为,中国要在战争中取得优势,需要有同日本相平衡甚至超过日本的军事力量。毛泽东指出,尽管日本在战争初期掌握着优于中国的军事力量,然而,“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5]469}。换言之,两军对垒,力量对比不但是军事力量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因为军事力量是要靠人心去掌握的。倘若中日两国,甚至世界上大多数人都站在抗日的一方,则中国在军事力量上的劣势将转化为优势。与此同时,经过长期战争和内外矛盾的削弱,日本的军事优势也会逐渐转化为劣势。此外,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和敌国的增加,倘若将来有一国或几国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公开对日作战,并公开对中国施以援手,那么军事力量的优势便转移至中国一方。与此同时,毛泽东承认,“在技术和兵员教养的程度上,现时我们不及敌人”^{[5]504},因而在战争中大规模歼灭敌人是困难的,由此驳斥了速胜论者急于求胜的非理性心态。

国家倘若没有较多的人口就无法把足够数量的人力投入战场作战,也无法形成建立和保持现代战争的胜利所需要的工业能力。毛泽东乐观地揭示,中国不但地大物博,而且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性的战争。尽管日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优于中国,使中国在战略上处于被动状态,但敌方兵力不足,不可能作无限制的进攻,而中国在人口和兵员数量上,以及民众和军队同仇敌忾的士气上却处于优势。这种优势加上其他有利因素,淡化了自己军力、经济力等方面的劣势,使这些劣势仅仅成为战略上相对的劣势。

国民士气是一个国家在和平或战争时期决意支持其政府的外交政策的程度^{[4]183}。国民士气的存在与否及其质量在国家的危急时期尤其容易反映出来。抗日战争中,虽然中国的武器和军队教养程度不敌日本,但日本的侵略却无法打垮中国国民抵抗的意志。1936年7月,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提到,日本在长期战争的消磨中,“士气行将颓靡”,而中国的抗战潜伏力却将日益奔腾高涨,大批民众不断奔赴前线为自由而战^{[5]514}。高涨的士气配合其他

因素,将使中国军民能够在反攻阶段对日本占领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致命的攻击,最终把日本军队驱逐出中国。

国家力量体现和运用在对外关系之中。因此,一个国家的外交质量,运用国家力量以实现国家外交战略与政策的目标的能力如何,也就成为国际关系中决定国家力量的最重要因素。国家外交质量一方面取决于外交战略和外交人员的素养,另一方面也受到文化、道德、制度等国际规范的约束。在对外战争中,战争的正义与否是决定一国能否获得国际支持的重要因素。日本的侵略是一场非正义战争,而中国的抗日战争却因其正义性而有望得到国际道德和世界舆论的支持。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在国际法西斯和反法西斯力量的对峙中,日本虽然能够得到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却也会遇到更强大的反法西斯国家的反对。后者的力量将逐渐增长,抵消前者的援助力量,并终将使日本处于孤立的国际地位,面临更大压力。大异其趣的是,“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5]449}抗日战争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将为中国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争取越来越多的国际同情和国际援助。世界人民运动的蓬勃发展、苏联的存在和国家援助,成为中国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条件。

即便一个国家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强大的工业能力和军事力量、高涨的国民士气和精巧的外交政策,倘若缺乏良好的政府加以妥善的组织,国家力量也无从展现。作为国家力量一个独立因素的良好政府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构成国家力量中国家资源和人力资源与所追求的外交政策之间的平衡;二是在上述资源中的平衡;三是获取公众对所追求的外交政策的支持^{[4]195}。政府能否制定符合自身资源状况的国家战略,能否在国家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合理配置各项资源,尤其是能否赢得公众对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支持,以及赢得公众支持的程度,同样影响着国家力量在对外战争中的运用。毛泽东认识到,虽然日本是东方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最强大的国家,但其侵略战争的野蛮性将最大地激起其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中国虽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不如日本强,但却出现了比任何历史时期更进步的一个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因此,抗日战争就“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

能性。”^{[5]449}

在毛泽东看来,中日两国综合国力对比之下,尽管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强于中国,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经不起长期战争。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满足长期战争的需要。在强弱对比之外,“还有小国、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这就是中国决不会亡的根据。”^{[5]452-453}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的实力落差虽然使日本的侵略野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因此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5]453}

二 持久战的应对策略与战争动员

抗日战争初期,虽然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远在中国之上,然而,毛泽东却提醒广大军民,“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5]478}能动性的发挥,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在既定的资源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动员和组织战争。毛泽东在分析中国在持久战中的应对策略时,极力动员全民族发挥优势以抗击日本侵略者。

地理因素是国家力量构成不可改变的一个因素。毛泽东在制定作战方针时,多次强调利用中国幅员辽阔的地理优势进行进攻的运动战,并辅以游击战,而不能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在他看来,尽管中国是弱国,但日本以少兵临大国,只能占领部分大城市、大道和平地,而在占领区域内部和中国其他地区则有大片土地无法占领。因此,中国可以凭借地大、人多、兵多的优势,在广大的活动地盘上开展游击战争。与此同时,日本以少兵临多兵,使自身处于多兵的包围中,中国也可利用地大和兵多两个长处,采用灵活的运动战,“以几个师对他一个师,几万人对他一万人,几路对他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5]485}。在依靠正规军展开运动战的同时,毛泽东并未忽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作用。他提出,有必要在全国的正规军中至少指定数十万人到敌后发动和配合民众武装,利用山地、平地 and 河湖港汉地的地理优势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并把“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

件下的运动战”提升为八路军的作战方针。

工业能力和财政经济是国家军事力量的后盾。毛泽东认为,反对日本进攻须实行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财政政策的原则在于“有钱出钱和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的财产”,经济政策的原则在于“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5]348}。为了增强后方工业能力以支持前方的战争,毛泽东认识到,应当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保证战时生产品的自给。在19世纪40年代初国民党对共产党军队停发军费和经济封锁的不利条件下,共产党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通过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和发展自给工业,不但巩固了抗日政权,而且为抗日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持。鉴于农村人力物力的分散性,毛泽东要求边区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通过减租减息和互助劳动,生产粮食和日用品,并通过公营、私营和合作经营等方式争取实现工业品的自给^{[6]1016-1020}。针对日本的“三光”政策和根据地日益缩小的不利局面,根据地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实行“精兵简政”政策,克服了财政经济困难,保存了战争力量。

战争是综合国力的竞赛。中国是否拥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武装力量,以及恰当的军事指挥,增强军事力量,成为决定抗日战争能否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因素。毛泽东多次提出要进行“全国军队的总动员”。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常备军已达二百几十万人。毛泽东认为,一方面要把海陆空在内的中央军、地方军和红军主力调到前线作战,另一方面要动员一定数量的后备军,给以训练,准备上前线。在充实兵员队伍的同时,他还强调要对军队的装备和给养给以合理的补充。针对战争初期中国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日本的劣势,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国须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便在战略反攻阶段中能够充分地执行阵地攻击的任务。”^{[5]500}他提出,中国一方面可以通过俘虏日本兵,夺取武器弹药武装自己,另一方面也可通过争取外国援助补充自身装备。与此同时,他认识到军事指挥对于战争胜负的重大影响,并呼吁召集国防会议以决定战略方针,改单纯防御的消极的作战方针为独立自主的积极的作战方针。面对敌强我弱的不利局面,毛泽东指出,“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待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5]491}。战争指挥员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能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可能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因此,

中国军民根据战争发展的真实情况,发挥主观能动性,完全可能从劣势和被动者转变为优势和主动者。毛泽东由此从辩证思维和主观能动性的角度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

为了提升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增强军队的群众基础,毛泽东强调改造军队的政治工作,实现官兵一致和军民一致。他肯认中国战胜日本的主要条件在于全国的团结和各方面的进步,尤其是军队和人民的进步。在他看来,军队的进步,故然需要增强技术条件,实现军队的现代化,但还需以进步的政治工作在军队中贯彻进步的政治精神,激发官兵的抗战热忱,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军事技术进步的效力。具体而言,就是“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5]511}。唯其如此,才能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支持长期艰苦的战争。

国家力量的运用离不开人口和物质资源的组织。毛泽东发现,“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5]503}。中国能否形成一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合理有效地动员全国的人口和物质资源投入抗战,将对战争的成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认为中国战胜和消灭日本帝国主义实力的条件在于建立三大统一战线:“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5]443}在这三大统一战线中,中国人民举国大联合的抗日统一战线是问题的中心点。毛泽东强调通过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结成民族统一战线以争取战争的胜利。为了动员民众力量,他一方面强调民众的政治动员和国防教育,另一方面呼吁政府进行一系列政治改革支持和鼓励民众投入抗战。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7]毛泽东意识到,抗日战争这场民族国家间的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5]480}。在他看来,政治动员是抗日战争中的头等大事。仅仅进行全国军队的总动员不足以赢得战争的胜利,惟有动员全国民众参与抗战,才能弥补武器不足等缺陷,克服战争中的一切困难。政治动员首先要告知军民战争的政治目的。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在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5]481}。惟有让民众了解这一目的,才能营造出全民族万众一心抵抗侵略的氛围。在此,毛泽东意图借助战争目的的宣传唤醒同胞的民族意识,激发全体军民的爱国热情,为抗战贡献

力量。

在告知抗战政治目的的同时,毛泽东认为还需阐明达到这一目的的具体步骤和政策,即抗日的政治纲领。在他看来,应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战建国纲领》普及于军民,并动员所有军民实行,坚持全民抗战到底。毛泽东指出,在符合国防的利益之下,学校、民众团体、干部人员要结合战争发展的情况和兵民的实际生活,通过口口相传、传单布告、报纸书册、戏剧电影等多种形式,以合乎民众口味的方式,经常性地开展政治动员和国防教育。

20世纪中国的国家建设急需培养具有民族国家意识和政治能力的现代国民。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作三民主义演讲时便谈到,“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8]。时隔13年,抗战初期的毛泽东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军队之所以胆敢来犯,主要是由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由于“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5]511},毛泽东呼吁中国兵民要克服这一缺陷。为了把民众吸纳到民族战争的洪流中,他提出通过热烈的政治动员补充兵源和财源,并要求军队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5]512},军民一致以打败日本侵略者。英国民族学家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民族主义者并不要求个体成员应该一个模样,而只是要求他们应该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团结纽带,并因此而在所有的本民族重要事务中“联合”行动^[9]。在抗日战争这场中华民族的“重要事务”中,毛泽东希望通过中国军民一致的“联合”行动以确保战争的胜利。

建立和巩固国内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中国军民一致的“联合”行动,有赖于增强民众对于政府的支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认为必须改革政治机构,实现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他提出召开真正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建立容纳各党各派和人民领袖共同管理国事的民主集中制国防政府。与此同时,还需宣布一系列新政,通过取消苛捐杂税、减少地租、限制高利贷、救济灾荒、改善兵民生活等方式争取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呼吁国民政府“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运动的旧法令”,“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开放党禁”,给予民众“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5]355},鼓励和支持民众投入全民族抗日的浪潮中。在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毛泽东提出在保证共产党占领导地位

的前提下,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的人员分配方案,以团结各爱国阶层投入抗日活动和民主政府的建设。考虑到蒙、回等少数民族是国内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毛泽东提出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动员蒙民、回民和其他少数民族共同抗日。

在全民族动员以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毛泽东还高度重视外交资源的利用。他深刻认识到:“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5]347}他强调中国军民应当加强外交和国际宣传,依靠国际力量和日本内部变化的援助争取抗战的胜利。他为同胞们描绘了一幅远景:倘若中国“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5]473}要结成这个天罗地网,不但需要发动外交和国际宣传攻势,而且需要中国军民通过流血战斗歼灭和消耗敌人,通过实力的展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政治实践中,毛泽东一方面积极推动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以争取国际援助,另一方面重视分化、瓦解和削弱敌人。他主张与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争取英、美、法的同情,并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向他们争取援助。1938年3月,他在延安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中要求世界青年学生“用口头和文字作宣传,劝告人民与政府给我们以物质上的帮助,不买日本货与不卖货给日本,直至组织国际抗日义勇军,准备于适当时机来华参加战争”^{[10]13}。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进一步指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6]806}。

在争取外援的策略上,毛泽东非常注重宣传的力量。他提出设立专门机构收集日军暴行,制成具体的文书报告,宣扬于海外,引导世界舆论,唤起国际力量联合惩罚日本。与此同时,他主张从各党派和人民团体中推出代表组织国际宣传团体,周游列国,唤起各国对中国的同情,配合中国政府的外交活动。此外,他还强调保护一切同情国家在中国的侨民及其和平通商、传教等事业,保护华侨利益,借他们的努力推进各国的反日援华运动。尽管这些措施在短期内也许无法争取到更多国际援助,但毛泽东却认识到,由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争,外交方针也应

当着眼于长期,“不重在眼前的利益,而重在将来的增援”^{[10]15-16}。

在推动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同时,毛泽东还特别注意对日本士兵的政治宣传工作。他提出,中国军民应当注意在政治上争取日本士兵,在了解 and 顺导他们的自尊心,宽待俘虏,引导其反思日本的侵略主义的同时,通过一次次歼灭战的打击向其展示中国兵民不屈的精神和顽强的战斗力,从而瓦解敌方意志。此外,他提出通过没收日本在中国的财产,废除其债券,收回其在华租界,剥夺其在华利益和便利的方式削弱敌人的力量。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强调:“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5]479}易言之,为了取得最终胜利,必须最大限度地动员一切国内外资源支持战争。

三 结语

抗日战争初期,在日本侵略者强大的战争机器下,中华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敌方强大的军事压力面前,在“亡国论”和“速胜论”扰乱人心的思想氛围中,毛泽东的抗日持久战思想深入分析了抗战三大阶段中日综合国力的优势与劣势,以及战争双方力量的转化过程,并在为持久战制定应

对策略的同时,进行了有力的民族动员。他和共产党的努力广泛地渲染了因日本侵略而激发出的民族情绪,塑造出“一个特殊的爱国精神”,推动了中国“从一种文明向一个民族的转变”^[11]。

[参考文献]

- [1] [美]费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279.
- [2]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民族与民族主义[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08.
- [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2: 153.
- [4] [美]汉斯·摩根索. 国家间政治: 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M].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0.
- [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7] [德]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 第1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43.
- [8] 孙中山. 孙中山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621.
- [9] [英]安东尼·史密斯. 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27.
- [10] 毛泽东. 毛泽东外交文选[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 [11] [英]休·希顿-沃森. 民族与国家——对民族起源与民族主义政治的探讨[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 382.

Mao Zedong's Thoughts on Protracted War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ZHU Jing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1731,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s thoughts on protracted war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melted national mobilization and refutation of “the theory of subjugation” and “the theory of quick victory” into a furn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trast in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the process of revealing the strategy of protracted war, he strengthened the national mobilization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nspiring national enthusiasm and winning the victory of the war.

Key words: protracted war; Anti-Japanese War;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national mobilization